

《東華漢學》第 20 期；289-328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4 年 12 月

圍城中的神聖：女作家筆下的基督教

余婉兒*

【摘要】

上海淪陷，主流男作家紛紛撤離上海，文壇留下虛位，一群非主流女作家張愛玲、蘇青、施濟美、潘柳黛、程育真等乘此契機在當時上海雜誌發表作品，贏得一時聲譽。

日據時期，女作家日常生活題材的書寫，並不僅是為逃避嚴峻的政治檢查。作品表面上沒有烽煙、血腥，卻無處不是戰爭和佔領的影子。小說中滲透的基督教元素和材料多元化，有用作營造氣氛、塑造人物的，有指向一種理想境界追求的，顯現了它作為抗拒凡塵俗世的利器的意義。基督教的書寫，是另類戰爭敘事。

本研究以基督教文化的表述為觀察點，分析女作家小說所呈現的宗教情懷，通過具體的文本梳理，審視她們面向混亂、不安的世俗經驗時，對亂世的回應。本文從構築靈魂憩息的空間、尋求精神的淨化和實現自

* 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我超越的人格去探討女作家在淪陷中的思考，析論她們尋找克服和消弭生命苦楚的方式，探索她們構築安放靈魂的淨土的理想。

關鍵詞：基督教文化、女作家小說、淪陷時期文學、上海文學

一、引言：封鎖中的文本策略

上海淪陷後，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撤離上海，文壇留下的虛位由一群非主流的女作家張愛玲（1920-1995）、蘇青（1914-1982）、潘柳黛（1922-2001）、¹施濟美（1920-1968）、²湯雪華（1915-1992）、³程育真（1921-）、⁴楊依芙（1920-？）、⁵邢禾麗（1923-？）、⁶鄭家璦⁷等填補，構成了一時的文學現象。

¹ 潘柳黛，生於北京旗人家庭，畢業於女子師範學校。十八歲隻身南下在南京報館工作，後往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工作十九個月，回上海成為記者。當時與張愛玲、蘇青和關露並稱上海四大女作家。散文及小說發表於《雜誌》、《語林》、《大眾》、《文友》、《大光》等刊物。1950年往香港，從事電影編劇及電影宣傳工作，最著名的是編《不了情》劇本和插曲。七、八十年代在報章專欄寫作，以「南宮夫人信箱」、「你我她」和「婦人之言」最受讀者歡迎。1992年移居澳洲，2001年10月30日病逝。著有《退職夫人自傳》、《明星小傳》、《婦人之言》等。

² 施濟美，小名梅子，曾用筆名方洋、梅寄詩等，浙江紹興人。生於北平，15歲入滬就讀培明女子中學，1939年考入東吳大學經濟系。1942年畢業，在上海淪陷艱苦清貧的生活中，執著創作，是「東吳女作家」之首。小說多以戀愛為題材，情思淒豔，蜚聲當時文壇。

³ 湯雪華，原名計中原，後隨養父改名為湯鍾元，筆名還有湯仙華、中原、張珞、小珞、東方珞等，為胡山源（1897-1988）寄女，就讀湖郡女校，因東吳大學與湖郡女校同一教會，故與就讀東吳大學的楊依芙（楊琇珍）、施濟美、程育真、俞昭明、鄭家璦等，被稱為「東吳女作家」。參考夢之儀，《紙上光陰——民國文人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145-152；朱文潔，〈東吳系女作家書影〉，《蘇州雜誌》2012年第5期，頁19-24；王羽，〈三位「小姐作家」〉，《新文學史料》2007年第1期，頁61-73；湯雪華等，《小姐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⁴ 程育真，著名鴛鴦蝴蝶派偵探小說作家程小青（1893-1976）之女，為虔誠基督徒，作品常出現有關禮贊宗教和音樂藝術的元素，多寫人類博愛與犧牲的高尚行為。

⁵ 楊依芙，常以楊琇珍之名發表作品，廣東新會人。卒業於培成女校，後入讀東吳大學社會系。她是《萬象》推出的「新人」女作家，受到主編陳蝶衣賞識，被譚正璧譽為「上帝的女兒們」的代表。資料參考素心，〈萬象四位女作家〉，《海報》，1942年6月22日；湯雪華等，《小姐集》，頁22。

⁶ 邢禾麗，原名邢念椿，1923年左右出生，江蘇常熟人。戰後到上海，入讀東

處身日據時期的文化界，反日和具政治意識形態的作品，受到嚴峻的監控。女作家書寫的並非展示慷慨激越、鏗鏘豪邁、保家衛國的文本，題材主要是「飲食男女」一類日常生活的表述，屬於超脫一類的文學，⁸這等創作非文壇正統，卻掙脫了當時的文學常規和政治傳統的束縛。這些作品表面上沒有烽煙和血腥，卻無處不是戰爭的影子，在外來政治勢力的控制和蹂躪下，它們不是遠離戰爭，而以另類戰爭敘事方式存在。就如張愛玲〈封鎖〉、⁹〈傾城之戀〉，¹⁰為淪陷的城市勾勒了一個危機四伏和動盪不安的背景，雖然沒有正面描寫戰爭和佔領，日常生活卻常在戰爭和封鎖的威脅下。已有論者指出這類書寫，並非只是因為逃避政治檢查而作認可題材的選擇，更是作家的文本策略，她們的寫作正是抵抗日常生活遭瓦解的行為。女作家是用轉折的方式去呈現抗戰與內戰交煎下民眾深重的苦難，飲食和男女是為延續個體和民族生命的抗拒表述；¹¹她們的創作也是面對戰亂、饑餓、死亡、掙扎的戰爭語境下，

吳大學附中，先後就讀東吳大學和聖約翰大學，攻讀文學。資料參考素心，〈萬象四位女作家〉；湯雪華等，《小姐集》，頁19。

⁷ 鄭家瓊，出身湖州名門望族，曾就讀湖郡女中。抗戰爆發後到上海，1941年進大學，先後就讀東吳大學國文系、英文系和聖約翰大學教育系。此後在中小學任教，曾主編《學生日報》文學副刊《新苗》，作品見於《春秋》、《幸福》等刊物，部分作品結集為小說集《號角聲裏》。生平資料參考陳青生，《年輪——四十年代後半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107；湯雪華等，《小姐集》，頁18。

⁸ 美·耿德華（Edward M. Gunn）著，張泉譯，《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6。英文版見Gunn, Edward M.,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

⁹ 張愛玲著，金宏達、于青編，〈封鎖〉，《張愛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卷一，頁97-107。

¹⁰ 張愛玲，〈傾城之戀〉，《張愛玲文集》，卷二，頁48-84。

¹¹ 余婉兒，〈隱私書寫：上海女作家小說的一種閱讀（1942-1949）〉，《性別與疆界》（南洋人文叢書國家疆界與文化圖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6），頁131-149。余婉兒，〈淪陷中的家國情懷——上海女作家小說分析〉，謝耀基、陳熾洪主編，《蕞緣論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頁131-147。

急於在文明毀滅前自救所呈現的生命美學。¹²女作家的書寫，隱藏著她們在這個懸浮於生死間的圍城中所尋找的剎那安穩。

除了日常生活和婚戀的敘述外，四十年代淪陷區的女作家還出現大量關於基督教題材的書寫。張愛玲在〈中國人的宗教〉提及：

女作家們很快就抓到了禮拜堂晚鐘與跪在床前做禱告的抒情的美。流行雜誌上小說裏常常有個女主角建立孤兒院來紀念她過去的愛人。這些故事該是有興趣的，因為它們代表了一般受過教育的妻與母親的靈的飛翔。¹³

這段話頗為尖刻地評論了當時女作家作品的特徵，既指出基督教在文學上的簡單化形式，也展陳了基督教在當年的形象和時人對現代化生活的想像，基督教文化代表了一種新觀念和新的生活方式。張愛玲的調侃和揶揄，表達了她對這類作品的不以為然，然而，女作家的大量表述，在戰爭的語境中卻可視為一種文本策略，她們利用宗教構築起一個寧靜祥和、讓人感到安穩的世界。

近年文化界熱衷於發掘、探討和重新定義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上海集體記憶，展開了以張愛玲為首及至蘇青、施濟美的研究，引起對上海淪陷區女作家系列的勾沉，不但是上海女作家，還有「東吳女作家」、「小姐作家」等等的探索，拓展了一個可觀的文學文化研究版圖，重構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系統。綜覽相關研究，少有從宗教角度討論上海淪陷區女作家的作品，耿德華（Edward N. Gunn）指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淪陷區的文學成就不宜忽視，然仍沒有從宗教角度展開討論。¹⁴本文以基督教¹⁵文化為觀察點，分析女作家小說所呈現的宗教情愫，通過具體的文本閱讀尋找她們對亂世的回應。

¹² 美·黃心村（Nicole Huang）著，胡靜譯，《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

¹³ 張愛玲，〈中國人的宗教·外教在中國〉，《張愛玲文集》，卷四，頁123。

¹⁴ 美·耿德華著，張泉譯，《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頁308。

¹⁵ 本文論及的基督教乃取廣義上的基督宗教，作一切信奉耶穌基督為救世主的

基督教在十九世紀末葉再次進入中國時，引起的回響遠較前代為大，主要因為當時有關倡導變革和維新的社會改革家或思想家，開始重視用宗教去塑造和提升國家道德、國民品質，建構優秀的國民和志士人格，以挽救國家民族的危機。及至「五四」，基督教有關改造國民性的要求更急切，陳獨秀指出基督教是復興中華民族的一帖良丹妙藥，他在〈基督教與中國人〉¹⁶中提及中國文化缺少「美的、宗教的純情感」，認為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¹⁷周作人為「五四」新文學注入人道主義內涵的重要理論〈人的文學〉，也是從基督教精神引發的。¹⁸基督教獲得知識分子的青睞，不但促使教育、經籍整理、出版和研究、醫療慈善等基督教文化事業蓬勃發展，基督教也進入中國思想及學術領域。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基督教信仰已經在這裏著地多年，有穩健的基礎。女作家每每受過基督教學校的教育，或身為基督徒。¹⁹她們的小說出現大量頌揚宗教精神，博愛和犧牲情操的描寫，有論者稱她們

各教派的通稱。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東正教和其他的一些小教派。故討論中國作家作品所受的基督教文化影響，不宜僅指向某一宗派。參考楊劍龍，《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頁1；王本朝，《20世紀中國文學與基督教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頁3；張慶熊，《基督教神學範疇——歷史的和文化比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1。

¹⁶ 陳獨秀，〈基督教與中國人〉，《新青年》第7卷第3號（1920.2），頁15-22。

¹⁷ 同前註，頁17。

¹⁸ 周作人，〈聖書與中國文學〉，《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1），頁1-7。

¹⁹ 女作家與基督教有不同的關係，施濟美、楊依芙、程育真、俞昭明、鄭家瓊、邢禾麗等曾就讀東吳大學，張愛玲就讀於聖瑪麗書院，東吳大學、聖瑪麗書院都是教會主辦的學校。湯雪華的養父是牧師，程育真更是虔誠的基督徒。參考陳青生，《年輪——四十年代後半期的上海文學》；胡山源，《文壇管窺——和我有過來往的文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259-270；陶嵐影，〈閑話小姐作家〉，《春秋》第1卷第8期（1944.3），頁100。湯雪華等，《小姐集》。

為「上帝的女兒們」，²⁰小說呈現的濃厚的基督教氣息，在烽煙處處、物質供應緊張、生活艱苦、精神疲累、慾望橫流的年代中，開闢了一個寧靜的角落。也反映了外來宗教文化在本土扎根、開花結果的情況，雖未能枝繁葉茂，在女作家的小說中卻能開出點點雅緻的花朵，小說所呈現的基督教與「五四」以來的文學既有雷同和差異，也有承傳和創新。

小說中所滲透的基督教元素和材料，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和作用。有些用來營造氣氛、塑造人物，有些指向一種理想境界的追求，顯現了它作為抗拒凡塵俗世的利器的意義。本文從構築靈魂憩息的空間、尋求精神的淨化和實現自我超越的人格去梳理女作家在淪陷中的思考，析論她們尋找克服和消弭生命苦楚的方式，探索她們構築安放靈魂的淨土的理想。

二、構築靈魂憩息的空間

（一）神聖氣氛的營造：基督教符碼的拼貼

程育真、楊依芙等作家的小說，每每把基督教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作為一種客觀的文化現象去表達，教堂、十字架、聖詩等與基督教相關的意象經常呈現在文本中，事件發生的場所會選擇在教堂或與宗教相關的地方，並塑造了一些具基督宗教氣息的人物。

楊依芙〈聖保羅教堂的晨鐘〉²¹、程育真〈聖母曲〉²²、〈玫瑰念珠〉²³明顯以基督教的符號命名，這清晰地展現了小說中基督教的痕跡，小說中出現的教堂、十字架、聖母像、耶穌像和聖經等等基督教符碼和

²⁰ 譚正璧指出以楊依芙為首的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作家集中表述了基督教文化關於愛和犧牲的主題，稱她們為「上帝的女兒們」。見譚正璧編，《當代女作家小說選》（上海：太平書局，1944），頁12。

²¹ 楊依芙，〈聖保羅教堂的晨鐘〉，《萬象》第2年第1期（1942.7），頁63-72。

²² 程育真，〈聖母曲〉，《小說月報》第2卷第5號（1942.2），頁104-108。

²³ 程育真，〈玫瑰念珠〉，《生活》第3期（1947.9），頁14-20。

象徵物營造了一種神聖的氛圍。除了視覺的形象外，特別偏向強調聽覺的觸感刺激，例如教堂的鐘聲、聖歌、聖樂，構築了一個超乎世俗的神靈境界，讓人對宗教產生嚮往和感悟，人物就在這種超凡脫俗的氣氛下展開活動，塑造了一些真誠、美善、高潔的形象，他們那些有異於凡塵俗世的言行便具有說服力，增加小說感染和動人的力量。

邢禾麗〈空課〉²⁴的學院校園內有「十九世紀英國式赤色尖頂的教堂，屹立在寬曠的草坪中央」，²⁵人物接受教育的地方是由宗教團體主辦的，這個描寫交代了人物富宗教氣息的生長環境。「緋色的晚霞斜抹在黯藍色教堂的背後，鑲金的十字架正浴在殷紅的光輝中，反映出絢爛的色彩」，²⁶程育真〈星星之火〉就在這種瀟灑聖潔色澤的氛圍中展開敘述。實際上，小說描述的只是一個欠缺互信，由誤解造成的愛情悲劇，除了教堂建築的佈景外，小說內容基本上與宗教沒有任何關係，作家卻有意在場景的鋪排和設計上為小說髹上一點基督教的色澤，讓教堂旁的建築物作為故事的現場。小說人物浩然和逸雲的琴聲伴隨教堂的影像出現，增添了一抹神聖色彩，使小說傳達的情感變得純淨，不含淫念。而描寫浩然彈出的琴音的比喻也跟基督教扯上關係，「像教堂裏連續擊打的曉鐘」、²⁷「像教堂的曉鐘」，²⁸可見程育真在創作時眷戀宗教元素的心理取向。她絕大部分作品都在營造基督教的氣息，完成一系列宗教意味極濃厚的文本。

張愛玲的作品少有宗教意味，然而也喜用基督教的事物作喻象，如「聖母像裏的金黃」，²⁹「耶教徒式的愉悅」、³⁰「似乎都不在上帝心上，只是耳旁風」、³¹「她溫柔的頭髮聖母似地垂在臉上」。³²在張愛玲滿溢

²⁴ 邢禾麗，〈空課〉，《萬象》第1年第11期（1942.9），頁138-141。

²⁵ 同前註，頁138。

²⁶ 程育真，〈星星之火〉，《萬象》第1年第11期（1942.9），頁109。

²⁷ 同前註，頁110。

²⁸ 同前註，頁114。

²⁹ 張愛玲，〈年青的時候〉，《張愛玲文集》，卷一，頁123。

³⁰ 張愛玲，〈花凋〉，《張愛玲文集》，卷一，頁144。

³¹ 張愛玲，〈桂花蒸阿小悲秋〉，《張愛玲文集》，卷一，頁174。

古典中國色彩的文字中，混雜著基督教的語言符號。在〈殷寶灑送花樓會〉，景物和人物的心理融和在一起，「春天的窗戶裏太陽斜了。遠近的禮拜堂裏敲著昏昏的鐘。太美麗的星期日，可以覺得它在窗外漸漸流了去」，³³小說利用窗外神聖景象去反照殷寶灑的內心世界，展示她相信自己可以跟老師羅潛之繼續維持精神上的戀愛，以她的魅力去拯救那沉淪的男子。這個有禮拜堂、有鐘聲的星期天的神聖場所，實是寶灑內心的鏡像，此刻她對自己的人格表現了一種跋扈的自信。鄭家璦的〈逝去的晴天〉也是借用「山崗上隱隱傳來夜禱的鐘聲」³⁴去烘托一個為他人犧牲的愛情悲劇。宗教色彩的殖入，使小說人物及其行事沾上聖潔的光華，成為突顯人物形象的底色。

有時神聖的場景是感召人心、讓人懺悔的催化劑：

一陣清脆的鐘聲自遠處飄來，慢慢的，近了，近了，又遠了。這不斷的鐘聲在四野回響著，撼動了我的心扉，使我不覺地張開了眼睛。……聆聽這悠揚而冗長的鐘聲，使我感到自己的渺小。我的靈魂似離開了我的軀殼，追隨那鐘聲的消逝處，深深的去懺悔我的罪惡。³⁵

車子停在羅馬式的教堂前，銀色的光輝照著那矗立在雲霄的十字架，是那麼的神聖和莊嚴。³⁶

以上是楊依芙〈聖保羅教堂的晨鐘〉裏莊嚴的鐘聲和十字架，人物在濃郁的宗教氣氛感召中完成他們的犧牲和救贖的高潔行為。〈燈塔〉³⁷也有類似的描繪：

慢慢的，我們走近一座教堂，夕陽的餘輝照射著頂上的十字架，放出輝煌的光芒。

³² 張愛玲，〈殷寶灑送花樓會〉，《張愛玲文集》，卷一，頁157。

³³ 同前註，頁158。

³⁴ 鄭家璦，〈逝去的晴天〉，《號角聲裏》（上海：大明書局，1949），頁46。

³⁵ 楊依芙，〈聖保羅教堂的晨鐘〉，《萬象》，頁65。

³⁶ 同前註，頁66。

³⁷ 楊依芙，〈燈塔〉，《萬象》第2年第8期（1943.2），頁38-49。

我們走進教堂，朝著聖母像前走去，兩旁閃著銀樣的燭光，在我的內心，立刻充滿了聖靈的感覺。

我瞧著蕭潔誠摯地跪在聖母像前，緊閉著眼睛，低聲地在祈禱。³⁸十字架、燭光、聖像、祈禱等等基督教相關的文字流露著莊嚴和神聖的氣息，讓人物受到宗教的洗煉和燭照，蕭潔正為「我」祈禱，表達了人與人間除了愛情外，尚有其他形式的情感，一種超出一般兩性浪漫愛情的愛情就在這種神聖氣氛的暗示中展開，提升了人物的情操和品格。程育真〈雲天的變幻〉³⁹有以下的描述：

綠色的垂柳裏，金碧輝煌的朝陽正照著深灰色的教堂。

鏗鏘的鐘聲振盪在人們的心底，就在這單純的鐘鳴的召喚裏，小佩夾著聖經與林淵並肩進行。⁴⁰

教堂與鐘聲使人物沐浴在寧靜、聖潔的光輝中，洋溢著超凡脫俗的氣息。所以，即使「林淵並沒有一點宗教信仰，然而他高興伴著小佩走進教堂去。他愛上了其中一些安靜的氣氛」，這是一種踏進烏托邦境界的想像，讓人物可以暫時離開俗世的囚禁。在〈音樂家的悲歌〉中，「無意間，目光接觸著壁上的耶穌的畫像，沙侖虔誠地緊閉著眼」，⁴¹耶穌的畫像是對麥沙侖的感召，現在的他並不是停留於此時此刻，而是想到將來，所以他隨後問及兒子歐文將來的願望。這正與前段「一陣清脆的晚鐘自教堂中飄來，冗長抑揚的鐘聲盪漾在黑沉沉的四野裏，使人心緒上感到一陣靈感，一陣淒涼」⁴²的環境相呼應，歐文就在這種充滿宗教色彩的氛圍中成長，塑造了他那充滿寬恕與仁愛的完美人格。

宗教的象徵物好像一個個符號，且能突破一般符號的語義局限，產生暗示性和體驗性。⁴³〈聖歌〉中，女傳道員夏靜雲「望著台上的鏡架，

³⁸ 楊依芙，〈燈塔〉，《萬象》，頁47。

³⁹ 程育真，〈雲天的變幻〉，《樂觀》，創刊號（1947.4），頁16-24。

⁴⁰ 同前註，頁18。

⁴¹ 程育真，〈音樂家的悲歌〉，譚正璧編《當代女作家小說選》，頁143。

⁴² 同前註，頁140。

⁴³ 趙靜，〈宗教修辭研究的路徑與方法〉，《宗教學研究》2011年第3期（2011.9），

一張耶穌在客西馬尼山祈禱的照相，手腕靈活地寫好一封不使崇宣失望的回信」，⁴⁴基督畫像在這裏代表了支持、愛心和智慧，讓靜雲可以把愛傳播，送予身體和心靈都在重病中，亟需安慰和同情的崇宣，可見宗教畫像這類具體形象是宗教力量的象徵。〈心有靈犀一點通〉⁴⁵的洛麗看到「金色的鏡架上是莊嚴慈愛的耶穌畫片，耶穌正在客西馬尼山祈禱，仁慈的眼光向著藍空凝視哀求」⁴⁶後，照片的神聖讓充滿為父母復仇情緒的洛麗開始轉變，那「超然的力量使她心弦為之振動」⁴⁷，受到耶穌為把他釘在十字架上的人祈禱的感召，洛麗放棄報復的想法。而〈夜禱〉中，幽文「在書桌上找到了桑醫生送的禮物，那是一張五彩的照相配著銀色的鏡架，照相上是一個美麗的少女靜默在燭光前合掌夜禱」⁴⁸，這張夜禱的照片喚醒了幽文，讓她擺脫情慾的困擾，避免破壞他人家庭的幸福。莊嚴神聖的畫像扮演了道德提醒者的角色，宗教產生了強烈的道德力量，發揮挽救人性沉淪的威力。

散落在小說各個角落的基督教符碼，連綴成一個宗教天地，基督教色彩劃出了一片樂土，讓人的靈魂有暫時的休息，程育真〈心有靈犀一點通〉中以教堂傳達了這個概念：

這幽靜的小小的聖地充滿著一種安靜的空氣，外間的人世彷彿是驚濤駭浪的汪洋。常常會令人們心中掀起擾攘的風波，惟有這聖地，是的，這小小的教堂中，人們找到了超乎尋常的欣悅。⁴⁹

教堂是一個象徵性的存在，女作家的小說通過器物、意象等視覺形象，塑造了基督教的文化場和心理場，⁵⁰使人擁有身歷其境的經驗，建構了

頁 185。

⁴⁴ 程育真，〈聖歌〉，《小說月報》第 3 卷第 6 期（1943.3），頁 87。

⁴⁵ 程育真，〈心有靈犀一點通〉，《天籟》（上海：日新出版社，1947），頁 43-51。

⁴⁶ 同前註，頁 46。

⁴⁷ 同前註。

⁴⁸ 程育真，〈夜禱〉，《小說月報》第 3 卷第 3 期（1942.12），頁 116。

⁴⁹ 程育真，〈心有靈犀一點通〉，頁 46。

⁵⁰ 趙靜，〈宗教修辭研究的路徑與方法〉，頁 186。

一個與神靈有關的空間，「暫時忘懷了世界的殘酷，不平，欺詐和死的痛苦」，⁵¹讓人物在紛擾的亂世中找到一片聖地、一個心靈休憩的空間。

（二）拯救的訊息：《聖經》及基督教義理的引用

基督教象徵符號的拼貼和鋪陳，人物向神明祈禱的描寫頻繁出現在小說中，女作家用了這些隱性的修辭方式呈現最表層和外在的宗教氣息，小說的深層宗教意蘊，則可在基督教精神與小說的內在關係中探究。湯雪華的〈三腳香爐〉：

二十歲！

踏過這小小的關，我彷彿亞當夏娃偷吃了生命的禁果，被上帝從可愛的「伊甸園」中逐出來了！⁵²

小說直接從基督教文化中攝取材料，採用了基督教《聖經》的詞匯和典故，以《聖經》典故作喻體去描述生命某一階段的遭遇，使人物的遭際勾連宗教的想像，體現了她在原罪中極為沉重的生活和心境。被逐出「伊甸園」後的顛沛流離和苦難，讓她經常想著能重返「伊甸園」，以逃避生命的困厄。另如湯雪華的〈亞當的子孫〉⁵³、張愛玲的〈創世紀〉⁵⁴等在小說篇名上採用了基督教《聖經》的詞彙，固透視了基督教知識對作家思想意識和寫作取材構思的影響，也讓小說增加了弦外之音。在基督教信仰中，人類是亞當的後代，不僅背後有一個創世的神支持，而且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創造的，其中既顯示了人並非孤立無援，擁有一個強有力的照顧者，也看到此刻人因為背叛神而被置於災難中，被神摒棄或面對試探，使人物產生回歸父家的企盼。〈亞當的子孫〉隱含了這一層的敘述。

⁵¹ 程育真，〈聖歌〉，頁 88。

⁵² 湯雪華，〈三腳香爐〉，《朦朧》（上海：日新出版社，1947），頁 15。

⁵³ 湯雪華，〈亞當的子孫〉（1-6，連載），《紫羅蘭》第 13 期（1944.5），頁 155-167；第 14 期（1944.6），頁 157-168；第 15 期（1944.8），頁 110-119；第 16 期（1944.9），頁 107-119；第 17 期（1944.11），頁 111-120；第 18 期（1945.3），頁 108-120。

⁵⁴ 張愛玲，〈創世紀〉，《張愛玲文集》，卷二，頁 221-264。

《聖經》中的話語經常直接呈現在小說中，例如湯雪華〈禍〉⁵⁵的標題旁的題辭就引用了《聖經》的話：「『舌頭在百體裏是最小的，……卻能把生命的輪子點燃起來！……』雅各書三章五節六節」，縱觀小說內容實跟基督教沒任何關係，只是「我」無意的向朋友透露了一個肺病人的患病歷史而引致的悲劇故事，無心錯說的話，拆散了他人的姻緣，最後更使兩個活脫脫的生命毀滅。另有一些小說，引用的基督教話語與小說較有內在連繫，並會借助人物的言行，直接傳遞基督教的道理。程育真的小說中，牧師和傳道人的講道，往往佔據了小說不少篇幅，例如〈聖歌〉、〈遺憾〉、⁵⁶〈笑〉、⁵⁷〈生的禮贊〉、⁵⁸〈雲天的變幻〉等等，讓基督的義理由人物的口中流出，直接傳達了基督教的信仰。有些小說人物則仿擬基督拯救的精神，潘柳黛〈黑瞳〉⁵⁹中的作家柳小姐引用了《聖經》的一段話「『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希伯來書」⁶⁰去鼓勵一個遭遇困境的女性，幫助她擺脫精神的困擾。蘇青《魚水歡》中的女作家欲效法耶穌基督救世的行為去拯救慾海流浪的女性⁶¹。

這些小說篇章有明顯的基督教救贖的信息，有些甚至通篇出現許多教義，傳教的信息過強，義理有餘而形象不足，缺乏藝術性。較富有文學審美意味的是那些能透過人物人格的塑造，含蓄而具體地表達基督教精神的文本，它們能以豐富和動人的藝術形象去渲染基督教色彩。在小說中，湧現著大量能體現宗教情感和宗教情懷的人物，他們通過具體的救援行動、犧牲性質的行為或人生態度去實踐基督教精神。這些救援者不一定是傳教士，但往往以神的使者的身份出現，利用宗教式的情感拯

⁵⁵ 湯雪華，〈禍〉，《光化》第1卷2期（1944.12），頁57-62。

⁵⁶ 程育真，〈遺憾〉，《紫羅蘭》第2期（1943.5），頁81-88。

⁵⁷ 程育真，〈笑〉，《紫羅蘭》第7期（1943.10），頁62-67。

⁵⁸ 程育真，〈生的禮贊〉，《大眾》1944年5月號，頁73-76。

⁵⁹ 潘柳黛，〈黑瞳〉，《雜誌》第11卷第1期（1943.4），頁130-134。

⁶⁰ 同前註，頁134。

⁶¹ 蘇青，《魚水歡》（上海：四海出版社，1949），頁120-121。

救人心，讓被救者感受到須棄絕罪惡，一心向善，為世界上保留真、善、美和愛的素質。

程育真的〈笑〉不僅引用了《聖經·羅馬書》十三章十二節「黑夜已深，白晝將至」作題辭，小說中多次重複這句話，內容更有「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的意涵。⁶²小說記述對生命充滿失望和消極態度的丹珊，得到姜先生向她傳播聖經中對罪人的愛和赦免的義理，最後獲得了心靈的解脫，對生命重燃希望和信心。〈遺憾〉中的老教授引導幽蘭踏足教堂，體驗宗教中的莊嚴和虔誠，讓本來不信的幽蘭感到主的恩愛，彷彿聽到主對她說「我們深信這世界和其他的情慾都要過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遠常存」⁶³。〈同情〉⁶⁴中的百特利孤兒院院長林道亮牧師和妻子，繼承前院長的志願，在艱苦離亂的環境中堅持照顧孤兒，以此體現基督教的服務、犧牲和博愛的精神，敘述者「我」（程小姐）在參觀孤兒院前，只懂嚮往和陶醉於膚淺和自私的Manderley生活，受到義人言行的感召後，促使她反思生活和人生，透過她思想的前後對比，更突顯孤兒院院長、牧師和妻子等人物的善行和宗教的感染力。〈生的禮贊〉⁶⁵透過牧師兒子捨己救人的精神看到「生的真諦，生的意義」，牧師只懂用口舌講道理，而他的道理卻由兒子身體力行，真正實踐了犧牲的愛，反過來讓牧師重新體認基督信仰的真諦。〈聖歌〉中年輕受著瘋癲病苦的林崇宣，無法從親友的關懷中得到慰藉，只有夏靜雲女士一首《耶穌於我》的歌聲和歌辭，能滋潤和安慰他苦痛焦灼的心靈，在死前能得到心靈的安撫。

程育真的〈贖罪記〉⁶⁶直接取材自《聖經》，用文學化的手段重演耶穌的故事。自「五四」以來，《聖經》中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形象，曾

⁶² 《聖經·羅馬書》13章12節：「黑夜已深，白晝將至，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⁶³ 程育真，〈遺憾〉，頁87。

⁶⁴ 程育真，〈同情〉，《大眾》1944年1月號，頁81-84。

⁶⁵ 程育真，〈生的禮贊〉，頁73-76。

⁶⁶ 程育真，〈贖罪記〉，《小說月報》第32期5月號（1943.5），頁78-83。

吸引過不少作家的筆墨，分別以詩歌或小說形式描繪過耶穌的受難事跡。程育真以小說形式重寫耶穌的犧牲和救贖過程，卻有異於其他作家，現選取部分作家筆下有關耶穌受難形象的塑造作比較。

冰心（謝婉瑩，1900-1999）的〈客西馬尼花園〉和〈骷髏地〉⁶⁷分別寫耶穌在園中祈禱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情況，表達了他面對死亡的悲痛和讚頌耶穌救世的偉大。用「父啊，成了！」作結，體現了基督捨棄生命拯救世人的獻身意識，傳達了冰心頌揚基督對人類完全的愛的虔敬之情。徐志摩（1897-1931）〈卡爾佛里〉⁶⁸雖然同樣敘寫負著十字架走向骷髏地的耶穌，但寫的並非基督拯救世人的神聖犧牲，而是借同情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歷史故事展示人性的邪罪和醜陋，人與人間的背叛和欺凌。徐志摩筆下的耶穌，只是現實生活中被構陷的悲劇人物，沒有彰揚他的神聖和犧牲。艾青（蔣海澄，1910-1996）於1933年6月16日寫了〈一個拿撒勒人的死〉，⁶⁹當時他囚禁在上海一所監獄裏，病魔纏身，且正值日本入侵上海，詩句表達了詩人對勝利的期待和嚮往。⁷⁰詩中的基督不僅是一個受難者，更是一個勝利者，這有異於《聖經》的記載，是詩人增加的情節，深切反映艾青書寫的目的不在耶穌的事跡本身，而是借以比況，以此鞭撻現實，鼓動鬥志和勉勵人心。〈耶穌之死〉⁷¹是茅盾（沈雁冰，1896-1981）應熊佛西約稿，1942年8月5日於桂林完成的小

⁶⁷ 冰心，〈客西馬尼花園〉和〈骷髏地〉，《生命》第1卷（1921.5），頁9-10。

⁶⁸ 徐志摩，〈卡爾佛里〉，《晨報副刊》（1924.11.17），頁4。詩題「卡爾佛里」指的是 Calvary, Golgotha 的拉丁名，希伯來文是 Gulgoleth，即骷髏地。

⁶⁹ 艾青，〈一個拿撒勒人的死〉，《艾青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4），卷一，頁63-70。此詩發表於《詩歌月報》第1卷第4期（1934.4）。

⁷⁰ 同前註。詩末定格在十字架上耶穌的上方釘著的一塊牌子「那上面／寫著三種文字的罪狀：／『耶穌，猶太人的王。』」耶穌不被承認為猶太人的救世主，詩的內容深具寄意，強調了外國及本國的敵人都反對他，耶穌遭受的是全面的背叛，那正是中國內外交戰，正義不彰的時代。詩歌充滿了對敵人、管治者斥責、詛咒的聲音，也表達了詩人對勝利的期待和嚮往。

⁷¹ 茅盾，〈耶穌之死〉，《茅盾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卷八，頁235-250。

說。據路易斯（Lewis Stewart Robinson）研究，⁷²〈耶穌之死〉從第一句開始，已明確顯示小說是一個政治寓言，紀錄了一個有良心的囚犯的政治性謀殺。⁷³魯迅（周樹人，1881-1936）的〈復仇（其二）〉，⁷⁴借助《聖經》原型再創造，突出耶穌受難時的心理感受和復仇心態，模塑了一個為民眾獻身卻不為民眾理解和接受的孤獨英雄。⁷⁵《聖經》中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為處死他的人祈禱，請求父神赦免他們的罪，傳達的是恩典、寬恕與憐憫。魯迅強調的卻是復仇，這跟《聖經》耶穌形象顯然有質的區別。

〈贖罪記〉與這些作家的基督敘述主要不同的，是程育真完整地敘述了耶穌講道、受難、復活、升天至差遣門徒往世界各地傳揚福音的情節，既有耶穌世俗的也有他神聖的面向。冰心、徐志摩、魯迅、艾青和茅盾只著力記述耶穌被殺害的世俗化一面，刪去復活、升天這神聖的一面。比較《聖經》原版本故事，〈贖罪記〉增加了許多景物描寫去渲染基督行事的畫面，這更突出作家關於傳揚基督教信仰的意圖。

耶穌在山園祈禱，悲痛至極，希望十字架的苦杯或能離開他，背景是「黝黑的深晚，郊外是那末慘淡，冷靜和淒厲」。⁷⁶耶穌被凌辱和被釘十字架時，背景是「天空中忽然飄下了細雨」，「荒涼的骷髏地」，⁷⁷「太

⁷² 美·路易斯·羅賓遜（Lewis Stewart Robinson）著，傅光明、梁剛譯，《兩刃之間：基督教與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臺北：業強出版社，1992），頁 262-276。

⁷³ 同前註。路易斯指出〈耶穌之死〉從第一句開始，已明確顯示小說是一個政治寓言，主要敘述被囚禁在巴比倫的猶太人在等待解放的呼喊，侵吞城邑的外邦人顯而易見指的是日本人。其後描寫了法利賽人和撒該人想方設法誘陷耶穌。耶穌被捉拿、審判、處死的過程突出了「白色恐怖」，正反映當時國民黨政府官員對反對者的鎮壓。而耶穌的罪是「鼓惑國民，該殺」，耶穌革命者形象更明確。小說最後的鏡頭是耶穌遭捨棄而死，邪惡的一方獲得勝利。

⁷⁴ 魯迅，〈復仇（其二）〉，《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卷二，頁 174-176。此詩寫於 1924 年 12 月 22 日，發表於《語絲》第 7 期（1924.12）。

⁷⁵ 楊劍龍，《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頁 26。

⁷⁶ 程育真，〈贖罪記〉，《小說月報》，頁 80。

⁷⁷ 同前註，頁 81。

陽消失在急流的黑雲中，骷髏地變得黝黑陰沉了」。⁷⁸耶穌向群眾、門徒講道、復活、升天和差遣門徒往外地傳教時，就有「遠遠隱約的鐘聲一陣陣盪漾在河面，是那末幽揚那末靈感」，⁷⁹「小鳥自在地飛翔在翳翳的大樹上」，「陽光璀璨地掩蓋著原野，野地中的百合花盛開在墳墓的四周」，⁸⁰「遠遠飄來的鐘聲是那末聖潔那末靈感」，⁸¹「歌聲漸漸低微，換來的是縹緲的鐘聲，是那末聖潔那末柔和那末靈感」。⁸²耶穌的講道、復活和升天的場景，被繪畫為神聖、和平、充滿希望和生命氣息的畫面。背景的描寫，薰染了相關的氣氛和情調，增強了小說的審美能量。

小說具體描述了耶穌所受的凌辱，他面對人類背叛感受到的苦楚：

想到難嘗的苦杯，耶穌的心憂傷得幾乎要死，終於他痛哭起來。⁸³

耶穌忍氣吞聲背著世人的罪債——十字架——無聲緩慢地踏著沉重的步子在高低不平的大道上走來。後面跟著哀哭的婦女，譏笑的兵丁和同釘十字架的盜犯。

荊棘冠刺破了耶穌的頭，鮮血和汗珠交拼地沾滿了臉，無神的眼子望著自己赤露的腳。

叮叮噹噹，二寸長的鐵釘刺透了耶穌的手腳深深進入木架。鮮紅的寶血從手掌中直往下流。木質的十字架已經染成紅色，荒土上還流著腥紅的血點。⁸⁴

這些段落的描寫，隱隱然有魯迅〈復仇（其二）〉的影子，細緻呈現了耶穌肉體承受的苦楚，「叮叮噹噹」的響聲，「二寸長的鐵釘」，從聽覺視覺展露著基督的苦楚，往下流的腥紅的血更有震攝力，形構了基督犧牲的偉大，讓罪人感到自己罪孽深重。魯迅重彩勾勒了十字架上的復

⁷⁸ 程育真，〈贖罪記〉，頁 82。

⁷⁹ 同前註，頁 78。

⁸⁰ 同前註。

⁸¹ 同前註，頁 82。

⁸² 同前註，頁 83。

⁸³ 同前註，頁 80。

⁸⁴ 同前註，頁 82。

仇，而程育真卻特別發出寬恕和赦免的強音：「原諒他，因為他所作的連自己都不知道。」⁸⁵「父呀，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⁸⁶，基督寬恕和大愛的義理不但沒被刪除，且多次強調。為強化基督的寬恕和愛情，敘述者更加插了議論，表達了強烈的讚美之情：

偉大的愛無代價地又一次赦免了猶大的罪。⁸⁷

這是無私的愛。除了耶穌誰還有這樣的大愛赦免殺害自己的仇敵呢？⁸⁸

為避免讀者忽視了耶穌行為的意義，小說用夾敘夾議的方式，把基督行為的意圖反反覆複貫串了整篇小說：

神聖的愛，善美的愛和偉大的愛使耶穌不辭辛勞忙碌奔波在各地傳揚天國的福音。每一次世人的悔改和認罪就是耶穌每天勞苦所得心靈上唯一愉快的代價。⁸⁹

耶穌為世人流血捨命，神的愛就在這時向我們顯明了。⁹⁰

神的計劃成就，耶穌為我們與神之間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⁹¹

小說又通過人物的話語和反應去表述基督的義理：

「夫子，我們真是該死的罪人……你的犧牲太偉大了。」⁹²

「是的，很多人在生活的高壓和罪孽的網綁下等待著救主的拯救。我們走吧！」彼得跟門徒們在小徑上穿進了叢林。⁹³

〈贖罪記〉有關氣氛的烘染，對耶穌的稱頌和舉揚，跟冰心的詩較接近。而在關注內容上，耶穌從死裏復活是基督教的核心精神，冰心、魯迅或

⁸⁵ 程育真，〈贖罪記〉，頁 81。

⁸⁶ 同前註，頁 82。

⁸⁷ 同前註，頁 81。

⁸⁸ 同前註，頁 82。

⁸⁹ 同前註，頁 80。

⁹⁰ 同前註，頁 82。

⁹¹ 同前註。

⁹² 同前註，頁 81。

⁹³ 同前註，頁 83。

茅盾等作家的作品都沒有描述，只截取了受難的一刻。〈贖罪記〉卻展示基督受難至升天等行事過程，敘述者往往是夾敘夾議，不僅通過敘述和描寫，更有議論抒情去展示基督的犧牲和拯救的恩典，有意識地渲染神聖的氣氛及救贖的色彩，這反映了作家執意要突出的是基督偉大的犧牲精神和崇高的拯救意識，這是一種直接傳播基督教信息的行為。

綜觀女作家的小說，鐫刻著不少《聖經》的語詞、基督教的義理和救贖的故事，以顯性修辭方式，通過話語的表述，傳達了基督教的精神實質。小說的表面內容，或人物的類型雖有差異，但核心內容明顯地展現了利用基督教的訊息和義理，去解決人內心的痛楚或人間世的苦難，讓人間美善重臨，讓灰心喪志的人重燃希望，獲得救贖。

三、尋求精神的淨化

（一）祈禱與懺悔

祈禱和懺悔都是靈魂探問的最基本形式，⁹⁴祈禱在基督教中有極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是宗教的靈魂和本質，是最具自發性和最屬個人的宗教表述，⁹⁵小說中有關這方面的敘述頗多。楊依芙透過小說人物指出「人到了最痛苦的時候，便需要宗教了！我想，除了上帝還有誰能赦免我的罪孽呢？」⁹⁶湯雪華〈在醫院中〉⁹⁷被肺病久纏的「我」也說「我知道現在只有基督的愛，才能把我從這痛苦矛盾的境地中釋放出來」。⁹⁸面臨災難或逆境，聖經中提到人會有尋找神的心，遇到困難時自然向神靠

⁹⁴ 許正林，〈中國現代文學與基督教文化〉，《文學評論》1999年第2期（1999.3），頁126。

⁹⁵ 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教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頁141。

⁹⁶ 楊依芙，〈聖保羅教堂的晨鐘〉，頁68。

⁹⁷ 湯雪華，〈在醫院中〉，《樂觀》第12期（1942.4），頁22-34。

⁹⁸ 同前註，頁34。

攏，⁹⁹小說人物常出現這種「尋找神」的行為。人物往往會自發地向神祈禱，或祈求救贖，或祈求贖罪，或向神感恩。汪麗玲〈婚事〉的羅敏知道母親推翻她和趙儀的婚事時，她痛心已極，就向上帝祈禱，冀能從上帝那裏取得力量，消除失戀的苦楚。在鄭家瑗〈前夕〉中這種冀求安撫和惠賜的宗教情緒是一種祈福：

遠處傳來悠長沉重的鐘聲，是禮拜堂早禱的時候了！我緊閤上兩眼，向冥冥中的神明作最虔誠的祈禱，願上帝在今晚上賜給我們闔家的安寧和母親的健康，並祝福大姊新生命開端的幸運！¹⁰⁰

敘述者焦慮大姊婚後的生活，在大姊出嫁前夕，感到世間一切不能把握和控制，空虛無著的感覺侵蝕著她，她只有向神祈求祝福，在虛無、憂恨中祈求神送來神聖的祝福，讓孤苦無依、軟弱無力的自我獲得神的眷顧。人物就借助祈禱的動作親近一個超越的主宰，尋找依賴，解決身心的痛楚和困窘。

在施濟美〈三年〉中，柳翔想到因為李微蘿的幫助，他才可以跟司徒藍蝶生活在一起，「他雖不信宗教，也不由得禱告上帝降福給她」，¹⁰¹這是一種感激的祈禱。無論有沒有宗教信仰，在平常生活中，人往往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但當面對特殊情況，無論是憂傷還是快樂，也突然感到自身能力的渺小，出現一種情感依附的需要，自然會做一些靠攏一個至高無上的神的行為，以祈求精神或肉體的安慰和愛撫。祈禱可分為讚歎感謝、痛哭哀求、靜心默想和心神契合四類，¹⁰²小說中出現的祈禱絕大部分只屬痛哭哀求或讚歎感謝，故這種宗教情感仍停留於渴求安撫和淨化靈魂的層次。

⁹⁹ 《舊約·何西阿書》，5章15節：「他們在急難的時候，必切切尋求我。」

¹⁰⁰ 鄭家瑗，〈前夕〉，《號角聲裏》，頁87。

¹⁰¹ 施濟美，〈三年〉，《鳳儀園》（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頁121。

¹⁰² 朱維之，《基督教與文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頁161。

蘇青〈結婚十年〉的懷青知道自己身染肺結核後，決定跟沒有感情且有外鶩的丈夫崇賢離婚。在曾禾醫生見證他們離婚時，她看著安慰她的曾禾醫生，不禁生出依賴神的心：

忽然起了宗教的虔誠，心中茫茫只想跪在她腳下做禱告：願我的孩子幸福，願賢幸福，願婆婆幸福呀！十年的往事都像雲煙般消散了，忘記我，讓我獨自在永恆的光輝下悄悄地替你們祝福吧！¹⁰³

懷青雖然在離婚和疾病的煎熬中，卻能把創傷昇華為一種宗教式的虔敬，此刻，她沒有任何的仇恨和痛苦，她內心充滿對其他人的關懷和祝福，她用愛取代了個人的苦楚，而且把這愛心廣推及於她本該怨懟的人，她在宗教式的感召中心靈變得平靜，彷彿長久焦灼後的紓緩，長久囚禁後的釋放。祈禱使懷青人格獲得提升，靈魂得到淨化。

女作家的小說描述了不少人物懺悔的行為，施濟美〈愛的勝利〉多次提及羅醫生為過去因無心之失使好朋友遇難身死，留下孤苦的兒子德祿而懺悔。這「懺悔」行為跟基督教可以沒有關係，但連繫人物隨後的話和行為，這不是一般的懺悔。不僅羅醫生說過「上帝叫我們愛人，不許我們恨人」的話，兒子大衛因為他「能為爸爸懺悔嗎？」¹⁰⁴的一句話，甘願冒險輸血給遇風暴受重傷的德祿，其後因而犧牲，可見小說有意把懺悔跟基督教信仰聯繫在一起，並與救贖相關。程育真〈生的禮贊〉中，牧師的兒子聽到耶穌為拯救世人付出釘十字架的贖罪代價後而向主懺悔，自責過去生活糊塗，虛度生命，只管自私地追求虛空的個人榮利，所以決定改過自新，隨神的引導。後來在一次教堂的火警中，為把困在教堂內的人救出，不惜以肉身作橋，讓小孩、婦女和老人踏著他的身體

¹⁰³ 蘇青著，于青、曉藍、一心編，〈結婚十年〉，《蘇青文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頁207。

¹⁰⁴ 施濟美，〈愛的勝利〉，《鳳儀園》，頁26。

攀到窗外以逃出險境，最後他為此而犧牲。¹⁰⁵小說展示了人物在懺悔中獲得了精神的超升，甘願為救人而自我奉獻。

湯雪華的〈髮網〉¹⁰⁶用另一種方式探索了基督教的懺悔意識。這懺悔是對往昔放肆不羈、沉淪墮落的生活的追悔，目的是渴望和企盼拯救者的救援，期望經由靈魂的洗禮和淨化，達到超越自我，再造本我的境界。¹⁰⁷小說寫了享盡榮寵、聲聞遠播的律師龍克成的懺悔，當他知道三十多年前被他引誘的少婦，為他而殺死自己的丈夫後，他痛悔不已，拋下三十年來贏得的榮譽、地位和金錢，隱居在小城，每個黃昏，用沉痛的眼淚向髮網懺悔。小說展示的是一種宗教式的懺悔，即使沒有法律監控和制裁，人也會直接面對、承認自己的過失和罪咎，以痛悔的心情誠懇地為自己的罪孽進行懺悔，並自我懲罰，祈求寬恕。

（二）心靈的修煉

世俗生活充滿各種慾望的引誘，人是軟弱的，極容易受誘惑，小說寫了這種人性的墮落和無可挽救的處境，只有遠離紙醉金迷，追求超乎俗世慾望的理想，才可走進光明和成功。

湯雪華〈亞當的子孫〉¹⁰⁸是有關基督教「原罪」觀念的敘述，認為人自身罪孽深重，需要不斷的監管自己的行為，避免受魔鬼的誘惑。小說借用了基督教《聖經》故事的典故，寫人物堅持抗拒世間慾望引誘，特別是情慾的誘惑。他們把慾望視為罪惡，是誘人墮落的魔鬼，能污染人的心性，讓人毀滅，阻礙人走向美好的生活。張成青三十歲喪偶，為了把九歲的兒子新培培育成一個「清潔正直」的人，他忍受情慾的折

¹⁰⁵ 程育真，〈生的禮贊〉，頁 73-76。

¹⁰⁶ 湯雪華，〈神秘的髮網〉，《大眾》1945年3、4月號合冊（1945.4），頁 65-70。

¹⁰⁷ 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教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頁 63-65。

¹⁰⁸ 湯雪華，〈亞當的子孫〉（1-6，連載），《紫羅蘭》第 13 期（1944.5），頁 155-167；第 14 期（1944.6），頁 157-168；第 15 期（1944.8），頁 110-119；第 16 期（1944.9），頁 107-119；第 17 期（1944.11），頁 111-120；第 18 期（1945.3），頁 108-120。

磨和難熬的孤寂生活，放棄續弦，「他想以自己的經驗來勉勵兒子，使兒子成一個清潔正直的人」。¹⁰⁹他努力為兒子建立一個好榜樣，讓兒子體會到自己父親正直不阿、行為端正的操守，跟抽鴉片的三公公、朝三暮四弄女人進門的仁叔叔的不檢行為和腐敗生活有異。新培在父親刻苦的生活感染下潔身自愛，在充滿聲色誘惑的上海堅持認真工作和生活，沒有越軌。小說特別以新培的好朋友李德保作襯托，德保對將來不存希望，認為自己「遲早總有一天要睡水門汀」，¹¹⁰他經常怨天尤人，工作態度散漫，抱怨生活沉悶痛苦。但同樣是小店小學徒的新培則對將來充滿期待和希望，他認為自己可以像店主馮先生一樣，由綢緞店的小學徒努力成為綢緞店的經理：

「馮先生」這三個字像一顆燦爛的巨星在張新培心中一亮，不錯的：馮先生現在擁著幾十萬家產，一所精緻的小洋房，兒女都在中學大學讀書，可是三十年前，豈不正像他一樣是個綢緞店的學徒嗎？¹¹¹

面對苦悶低賤的學徒生活，德保的反應是埋怨和灰心喪志，而新培卻能從現在的低三下四的工作中窺見將來的前景。二人反應這樣不同，就是因為新培有一個好父親，而德保有的是「一個吃鴉片的哥哥，一個軋著三四個姘頭的嫂嫂」，¹¹²在生活中沒有榜樣式的人物作道德的航標，德保只有沉淪。〈亞當的子孫〉中多方渲染罪惡泛濫的情況，小說透過《靈修初步》指出「我們都是亞當的子孫，都是從胎裏就帶著罪孽來的」，¹¹³直接指出人類性格中罪惡的原發性特質，基督教舊約《聖經》提及自從亞當、夏娃受誘惑被逐出伊甸園後，人就較易離棄神易受試探而犯罪。張成青和新培為了完成心中對遠景的追求，須逃避、克制個人

¹⁰⁹ 湯雪華，〈亞當的子孫〉（3），《紫羅蘭》第15期（1944.8），頁116。

¹¹⁰ 湯雪華，〈亞當的子孫〉（2），《紫羅蘭》第14期（1944.6），頁160。

¹¹¹ 同前註，頁160。

¹¹² 同前註。

¹¹³ 湯雪華，〈亞當的子孫〉（5），《紫羅蘭》第17期（1944.11），頁111。

的慾望，他們深深的理解「魔鬼拖人犯罪，使人痛苦」¹¹⁴，人物刻苦地磨礪自己，儘量擺脫慾望的引誘，服從於至高無尚的主，最後人物能完成一個洗煉和淨化慾望的過程，有修煉的意義。這篇小說可說是人受原罪的綑縛和羈絆，需要釋放和解脫，以便超越自我，到達一個安身立命之所的一次表述。小說的敘述展現了一點靈與慾的搏鬥，但這衝突極為輕微和簡易，沒有構成較大的張力，反映到作家對宗教生命理解和體驗的深度不足。

這種對慾望的淨化與「壓抑」並不相同，壓抑往往是懼怕懲罰，且易於失敗，就如湯雪華的〈死灰〉¹¹⁵表達了對情慾壓抑的經驗，最後兩位女性人物的壓抑行為並不成功，慾望始終勝利。而且壓抑更可能導致人性的極度扭曲，張愛玲的〈金鎖記〉、¹¹⁶〈紅玫瑰與白玫瑰〉¹¹⁷等儘寫慾望壓抑所造成的人性毀傷。但在〈亞當的子孫〉中所顯示的慾望的抑制卻能把人導向美善，張成青和新培是心甘情願地為追逐心中的理想而謀求人性的轉化，經過宗教式的精神修煉過程，他們可以抵達慾望淨化的境界，這並非壓抑，而是一種人性和心靈的沉澱和昇華。

四、實現自我超越的人格：基督精神的現實化

在小說中流淌著的宗教情調是「神聖的拯救意識，偉大的犧牲精神和向美趨善的廣博愛心」，¹¹⁸女作家以基督教的精神陶鑄了人物的性格，讓人物可以突破有限的個人，導引他人和自己進入超越的境界。施濟美〈愛的勝利〉描述大衛犧牲自己救活一個對父親及自己充滿宿恨的

¹¹⁴ 湯雪華，〈亞當的子孫〉（5），頁 120。

¹¹⁵ 湯雪華，〈死灰〉（上、下，連載），《紫羅蘭》創刊號（1943.4），頁 94-103；第 2 期（1943.5），頁 92-100。

¹¹⁶ 張愛玲，〈金鎖記〉，《張愛玲文集》，卷二，頁 85-124。

¹¹⁷ 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張愛玲文集》，卷二，頁 125-163。

¹¹⁸ 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教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頁 129。

好朋友的故事，表達了愛可以化解和消弭仇恨。小說描述受重傷的德祿出場的情景時，各人都圍在這個重傷的年輕水手身旁，為他的傷勢焦慮，大衛也在其中，當時「他像一個悲天憫人的傳教士一樣」，¹¹⁹這是對大衛身上反映的宗教式情操的書寫。作為醫院院長的父親羅醫生，知道兒子大衛身體孱弱，未必能安全輸血給德祿，但他看到大衛「那一雙眸子裏，流露著人世間最真、最善、最美的光，那是一種偉大聖潔的愛」，¹²⁰他理解到兒子的心願，於是為德祿動手術，完成大衛的理想，最後大衛輸血給德祿後離世。為了愛，大衛甘願奉獻自己的一切，以具體實際的犧牲行為完成了一次人格完善的旅程。人物取名大衛，故讓人聯想《聖經》的人物，小說用了「最真、最善、最美的光」、「偉大聖潔的愛」去塑造大衛的形象，也充滿基督教的色彩。大衛是因輸血給德祿而犧牲的，具有基督血的犧牲的象徵意義，小說通過人物的行為體現了基督教的犧牲精神。

女作家書寫最多的文本是借助世俗的浪漫愛情模式追尋超乎世俗的情感和靈智，以此表現出濃厚的宗教情愫。小說特別強調愛情中的犧牲，這不是一般因為親情或工作需要所作的犧牲，好像燕雪雯〈海上的孤帆〉、¹²¹施濟美〈悲劇和喜劇〉¹²²是為了成全一個親愛的人，放棄自己的愛情，把情人轉讓。這種放棄，固有犧牲成分，但這還只是停留在俗世層面的考量，有些小說人物對個人愛情的犧牲，是超越一般凡塵的情和愛。

施濟美〈紫色的罌粟花〉是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透過十七歲的思佳的言行，表達了一種超乎世俗的愛。思佳愛上有婦之夫的英文老師，但她不希望老師為她而離婚。她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已佔去了他人的丈夫，甘心長期忍受師母不斷的侮辱和嘲罵。思佳二十歲時，老師因為從

¹¹⁹ 施濟美，〈愛的勝利〉，《鳳儀園》，頁 21。

¹²⁰ 同前註，頁 23。

¹²¹ 燕雪雯，〈海上的孤帆〉，載譚正璧編，《當代女作家小說選》，頁 319-338。

¹²² 施濟美，〈悲劇和喜劇〉，《鳳儀園》，頁 188-202。

事秘密愛國工作而慘死在敵人的嚴刑下，師母丟下四歲的兒子安安改嫁。年輕的思佳收留了安安，負起做母親的責任。最後因為照顧猩紅熱症的安安，染病死去。敘述者對她的犧牲有這樣的描述：

有甚麼能用來哀悼這樣一個善良而美麗的靈魂呢？她的一切，感受、磨難、犧牲、天使般的愛情，生於它的痛苦的，死於它的痛苦的，使人間的正義也傾心拜倒的一種崇高的熱忱；在遙遠的天國，她應當是快樂的，因為犧牲必蒙得安慰。¹²³

小說用了「天使般的愛情」、「天國」等基督教的詞匯，讓思佳成就的愛超越一般世俗淺薄的男女浪漫之愛，隱隱然具有宗教意味的聖潔之愛，是精神的，而非肉體的。〈三年〉寫的也是犧牲調子的愛情，塑造人物形象時作家刻意傳達人物所具有的宗教意味，「聖母型的臉上有著不可思議的表情」¹²⁴是對司徒藍蝶的描寫，藍蝶不僅有「聖母型」的外觀，她其後的行事確能體現了聖母的犧牲和博愛精神。為了成全病重的黎萼的愛情，她樂意退出她與柳翔的關係，並背上忘情負義之名。藍蝶將愛化為一種超越世俗關係的大愛，男女之愛、親情之愛都是偏狹的，以博愛精神傳播的愛，才能締造真善美的世界。這些具有宗教品格的女性，能褪盡社會功利的色彩，不受情慾的羈絆，具濃重的犧牲和獻身意味。

程育真〈夜禱〉中的幽文，雖然受到家長因為傳統迷信思想，阻撓她和哲偉的婚事，她沒有因此而妥協和屈服。但當她看到陸萍時，被她「純潔，大方，坦白，高貴」¹²⁵的氣質折服，認為哲偉可以從陸萍那裏獲得更大的幸福，決定放棄她跟哲偉的關係。這種犧牲，有意識把愛情的追求提高至宗教性的審美層面，她因為對一個完美聖潔的形象的景仰，為所愛的人設想而甘心成全陸萍和哲偉的婚姻，這種「不求自己的益處」¹²⁶的愛，提升了俗世愛情的素質，拓寬了愛情的內涵。

¹²³ 施濟美，〈紫色的罌粟花〉，《鳳儀園》，頁 55。

¹²⁴ 施濟美，〈三年〉，《鳳儀園》，頁 111。

¹²⁵ 程育真，〈夜禱〉，頁 113。

¹²⁶ 《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13 章 5 節。

為了完成人物完美的形象，小說往往刻繪了人物聖潔的形象，程育真〈雲天的變幻〉：

她披在背上的長髮，白皙的頸項，他心有所感，小佩有堅定的意志和一顆善良的心，他彷彿看見小佩的一塵不染的聖潔的靈魂在面前跳躍。¹²⁷

小佩神聖虔誠的造形，正與她對愛情的堅貞和獻身社會的行為相輝映，程育真由外至內塑造人物完美的品格。這種聖潔的形象也出現在她的〈白衣天使〉¹²⁸中，「稚月披著潔白的手術衣悄然獨立，那一種聖潔的儀表，就是白衣天使，給病痛者施捨著同情與憐憫。」¹²⁹其後稚月為挽救鼠疫病人而染病犧牲。楊依芙〈聖保羅教堂的晨鐘〉的畫家柯琪找蘇妮為聖母像作模特兒，是因為蘇妮聖母般的神聖外表，及後蘇妮的為人犧牲的行為，證實了她的聖潔特徵。女作家的小說通過人物外形與言行的相互襯托，表現了他們擁有神聖的光輝。

小說中博大無私的愛，洋溢著基督式的犧牲精神，折射出作家以宗教去提升人生、關懷人生的意念。有關女性的肖像描寫不但理想化，且有神性意味，擺脫了女性只作為「肉體」存在的特徵。這些小說一方面表達了神聖的宗教對人心和人性的救贖和超昇，讓女性人物昇華為一種理想的形象，重構了女性人格；另一方面，顯示了女作家對「神聖」的追求，對宗教精神的依戀，小說承載著濃厚的基督教意蘊。

女作家對基督教情愫孜孜不倦的表達，固然基於她們的信仰或基督教教育的洗禮，更可理解為她們對塵世的體察和感悟。小說展露了一個充滿各種各樣的罪惡、慾望泛濫和人性軟弱的空間，而基督教的精神成為擺脫和抗拒紅塵罪惡引誘的力量和聲音：

¹²⁷ 程育真，〈雲天的變幻〉，頁 18。

¹²⁸ 程育真，〈白衣天使〉，《天籟》，頁 61-67。

¹²⁹ 同前註，頁 63。

粉紅色的信紙，嬌羞的粉臉，迷惑的媚眼，情慾的誘（惑），在沙侖心中撒下了罪惡的種子，他忘記了自己是個教徒。¹³⁰

這是一個物慾橫流、心性墮落、充滿罪惡的世界。程育真〈音樂家的悲歌〉中，身為基督徒的音樂家麥沙侖，本有美好幸福的家庭，但在名成利就時，受到鋪天蓋地而來的情慾引誘，名利已淹沒了他的理智，他變得軟弱，不能抗拒力大無比的誘惑，他的道德日漸淪喪，竟至拋棄妻兒，突然失蹤，最後過著墮落流浪的日子。跟他的兒子歐文能堅守聖潔的生活，終於成為一個出色的音樂家形成強烈的對比。

女作家不但寫了慾望不但坑害人物的生命，也使人的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程育真〈笑〉中年輕的丹珊失去歡樂和笑容，內心充滿怨懟和憤恨，「覺得這個世界沒有真正的愛，沒有情義；人心變得兇惡；社會日趨墮落。每一個人是賣弄他欺騙的手段，競爭，嫉妒，劫奪，兇殺」，她看到的是「埋沒了良心的人無情的出賣他的朋友」、「因為貪愛錢財用不正當的行為去破壞大眾的幸福」¹³¹。雖然她專心投入繪畫大自然的活動中，然而僅憑大自然的美景、人間的愛和藝術等方式皆不能幫助她治癒嚴重的精神創傷，她對人完全失去信心，心靈充滿憂傷和怨恨，她只求神的重罰能早臨人世，以殲滅人類。後來因為繪畫老師姜先生不斷以基督信仰啟迪她，並刻意為她畫了一幅有笑容的畫像，在姜先生遠去他方後，她從畫像中感受到聖經上所說的「黑夜已深，白晝將至」的召喚，她開始相信終有一天她會重展笑顏，她內心的傷痕由此逐漸消失。人物面對心靈的創傷，往往可從上帝那裏得到安撫：「感謝上帝，他又像每次一樣，在我最痛苦失望的時候，使我又回頭來看見他的慈容」¹³²，只有利用基督教信仰才可以使人物在絕望中尋回失去的快樂和希望，重

¹³⁰ 程育真，〈音樂家的悲歌〉，載譚正璧編，《當代女作家小說選》，頁144。引文中的「情欲的誘」該是「情欲的誘惑」之誤。

¹³¹ 程育真，〈笑〉，頁66。

¹³² 湯雪華，〈在醫院中〉，《朦朧》，頁36。

塑青春的人生和美好的世界。小說明顯地指出救贖的希望不能在凡塵中找尋，拯救人心和精神的力量來自宗教。

基督教信仰是以一種寬恕和博愛體認，並非以懲罰的模式呈現，強調的是一種愛的信仰。施濟美的〈愛的勝利〉，以愛和犧牲去消弭憎恨。這種寬恕與愛的調子不斷重複在女作家的小說中，程育真〈愛人如己〉¹³³中年老的蘇醫生，直接身體力行地見證了基督的博愛和愛人如己的精神，他不辭勞苦的救治病人，終於「像基督一樣服務到死」，¹³⁴在人間留下了愛。〈心有靈犀一點通〉，¹³⁵洛麗就是因為把持「愛不能買，不能賣，愛的價值，就是愛。那許多仇恨，妒忌，輕蔑都是生命的咒詛，人世間已沒有醫罪的方法，除非給予更多的愛」¹³⁶的信念，愛她的仇敵，放棄了向殺父母的二舅復仇的意念，二舅也因此而皈依基督。〈笑〉透過姜先生向丹珊指出「世界上缺少愛，那麼你應該把你的愛獻給這個世界；不要存著惡心要求神的刑罰。用你的愛心為這些罪惡的人們代求祝禱，求神赦免他們」，¹³⁷最後丹珊可以從笑和愛中領悟到生命的亮光。〈音樂家的悲歌〉中曾經沉淪慾海的麥沙侖，看見長大後的麥歐文，他以陌生人身份問及歐文會否寬恕有罪的人，歐文的回應是「我應該原諒他，同情他，甚至愛憐他，不過那罪人一定要肯認罪改悔」，「罪能敗壞人格，能挑啟爭端，惟有愛能遮掩一切過錯」，¹³⁸小說反複地訴說寬恕和愛的行為，以此體現基督教精神。

基督教在中國傳遞了崇高的犧牲、偉大的寬恕和平等博愛的精神，¹³⁹程育真、施濟美等女作家利用基督教精神轉化和昇華人性，表達了人類永恆的愛情。小說洋溢著宗教的慰藉和道德意義，讓人物超越世俗的誘

¹³³ 程育真，〈愛人如己〉，《天籟》，頁 8-14。

¹³⁴ 同前註，頁 13。

¹³⁵ 程育真，〈心有靈犀一點通〉，《天籟》，頁 43-51。

¹³⁶ 同前註，頁 48。

¹³⁷ 程育真，〈笑〉，頁 66。

¹³⁸ 程育真，〈音樂家的悲歌〉，頁 150。

¹³⁹ 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教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頁 124。

惑，實現對生命的救贖。小說中關於拯救意義的表述較深入地書寫了宗教的精神意蘊，在硝煙迷漫、人性軟弱墮落的困境中，人物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是無所適從的，女作家強調了一種精神的救援和形而上的追求，為人性開拓了一方淨土，季紅真認為：

宗教是一種自我超越的理論，知與愛的衝動來自人的本性，就是對終極實在的追求。在這種追求中，人邁向整體，邁向大全。從自私走向人性，從死走向生，從偏狹走向愛。在自我的超越中，使心靈得到寧靜。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¹⁴⁰

這方心靈的淨土，在小說中就由人物的無私和大愛的自我超越中建構完成，蘊釀了一片的安寧。因此，女作家的小說，題材雖局限在婚戀、日常生活的範疇而被評為視野狹窄，然而，在戰爭和封鎖的背景中，小說以愛情的模式傳達了超越人性的關懷和追求，強調愛的信仰對人生的意義，這類小說的結構往往是人獲得愛的啟示後得到拯救和精神的復活。這是尋找生命救贖可能的方式，小說關注到生命彼岸的問題，期望以宗教去安撫現世的苦難人生，是對動盪不安、浮華世界的一種抗拒。

五、結語

宗教是實現根本轉變的一種手段，根本轉變是指「人們從深陷於一般存在的困擾（罪過、無知等）中，徹底地轉變為能夠在最深刻的層次上，妥善地處理這些困擾的生活境界」。¹⁴¹當日張愛玲曾說「這是亂世」，¹⁴²這個時代的徵兆是分崩離析、悸動不安和轉瞬即逝，¹⁴³面對這

¹⁴⁰ 季紅真，〈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宗教意識〉，《文學評論》1996年第5期（1996.9），頁44。

¹⁴¹ 美·斯特倫（Frederick J. Streng）著，金澤、何其敏譯，《人與神 宗教生活的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2；英文版參考 Streng, Frederick J.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Life*.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1985, p.2.

¹⁴² 張愛玲，〈我看蘇青〉，《張愛玲文集》，卷四，頁238。

¹⁴³ 美·黃心村著，胡靜譯，《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

種惶惶不可終日的生活、混亂不堪的世俗經驗世界，人物充滿苦悶、悲涼，體驗著無盡的痛苦、消沉、失望和虛無。宗教為人提供精神的平衡，使失衡的生命得到安撫，是克服和消弭生命苦楚的一種方式，人可以借助宗教的教化和啟迪渡過心靈和精神的困境，書寫有關宗教精神的追求，是對精神和彼岸世界的眷戀和皈依。女作家的小說展示了以基督精神、愛的哲學去灌溉和滋潤乾涸和苦澀的亂世，尋找安放靈魂的烏托邦的態度。

小說中出現的基督教意識，並不代表人物深刻的宗教體驗，但正如王本朝所說「無論他們表達的深刻與膚淺，完整與簡單，都因有了基督教的指涉，而有了文學意義和語言形式的變化」，¹⁴⁴小說中的宗教意味豐富了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宗教與文學的共同特徵是「運用幻想去虛構一個美好的世界，以滿足人類永不安寧的精神渴求」，¹⁴⁵小說通過十字架、聖像等等基督教意象，營造了神聖的氛圍，《聖經》的用語、典故、義理的運用，散播著拯救的訊息，又以基督教精神塑造人物的性格和行為，織就了愛的羅網，以此顯現了一個由宗教構築的想像天地，突破和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視野。

有論者論及女作家作品的宗教情緒在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落潮與斷裂時期，¹⁴⁶認為三十年代以後，基督教的信仰漸趨淡化，¹⁴⁷然而在四十年代上海女作家的小說中，卻能發現不少作品具有濃厚宗教情緒，有意追求現世生命的超越。冠有「海派」之名的上海小說，¹⁴⁸向被視為

頁 57。

¹⁴⁴ 王本朝，《20世紀中國文學與基督教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頁 9。

¹⁴⁵ 蔡毅、尹相如，《幻想的太陽——民族宗教與文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頁 3。

¹⁴⁶ 吳玉杰，〈中國現當代女作家的宗教情緒對女性文學的影響〉，《遼寧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1995.1），頁 29。

¹⁴⁷ 季紅真，〈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宗教意識〉，頁 49。

¹⁴⁸ 李嶸明把蘇青、施濟美、張愛玲、潘柳黛等劃入海派作家的範圍，特別強調海派放棄精神的書寫模式，並以生活的平庸為樂趣。參考李嶸明，《浮世代代傳——海派文人說略》（北京：華文出版社，1997），頁 209-220、236-257。

世俗化，是庸俗和媚俗的，只輾轉停留在人世間的飲食男女等基本生活需要上。通過具體的閱讀和分析，卻能發現小說展露了濃厚的宗教色彩，明顯看到小說借助宗教的感召，出現向上超升的精神，陶鑄了高尚的道德人格、博愛精神，溢出世俗化、沉淪化的表述泥淖。小說中呈現的這個現象，有助重新思考一般論者對上海小說「欠缺神聖」的定論，四十年代女作家的小說世界，實擺動於神聖與世俗之間。

蘇青曾自問「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時代，還要寫甚麼？」¹⁴⁹女作家的寫作就是參與表達和討論戰爭、淪陷的體驗，她們以個人寫作回應時代。小說中散佈著教堂、十字架、鐘聲、聖歌等形形色式的光影和聲色，編織了一個和平而寧靜，具有神聖意義的天地，人物追求心靈的淨化，以具體的實踐完成崇高、理想的人格，以此體現宗教的意識和觀念。這種情境正與圍城中硝煙、璀璨斑斕的霓虹燈和靡靡之音的塵世相抗衡，顯示了心靈的安撫，對慾望世界的離棄，精神世界的追尋，表達了一種現世情感的昇華，擺脫沉淪命運的掙扎。在紛擾無著的現實紅塵、無愛的世紀，個體生命懸浮在惘惘威脅中無法掌握，扭轉乾坤的拯救者是誰？「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我們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¹⁵⁰女作家關於基督教的書寫，也是一個「求得自己的平安」的象徵行為。寫作是一種自救，而基督教的書寫又把救贖權交回這個創造天地，也是把人類逐出「伊甸園」的主宰，人所作的懺悔、自我懲罰、修煉等等，都是祈求贖罪的過程，然而手握救贖權的仍是上主，這其中不無弔詭，反映了女作家在執筆時的矛盾。

吳福輝把蘇青、施濟美、張愛玲納入海派傳統，認為海派小說婚戀視角突出，較世俗化和通俗化。參考吳福輝，《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¹⁴⁹ 蘇青，〈《飲食男女》後記〉，《蘇青文集》，頁457-458。

¹⁵⁰ 張愛玲，〈我看蘇青〉，《張愛玲文集》，卷四，頁238。

主要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新舊約全書》（和合本電子版），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97。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美〕耿德華（Edward M. Gunn）著，張泉譯，《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美〕斯特倫（Frederick J. Streng）著，金澤、何其敏譯，《人與神——宗教生活的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美〕黃心村（Nicole Huang）著，胡靜譯，《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

〔美〕路易斯·羅賓遜（Lewis Stewart Robinson）著，傅光明、梁剛譯，《兩刃之間：基督教與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臺北：業強出版社，1992。

王本朝，《20世紀中國文學與基督教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朱維之，《基督教與文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

余婉兒，〈淪陷中的家國情懷——上海女作家小說分析〉，載謝耀基、陳熾洪主編，《蕞緣論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頁131-147。

———，〈隱私書寫：上海女作家小說的一種閱讀（1942-1949）〉，載《性別與疆界》（南洋人文叢書國家疆界與文化圖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6，頁131-149。

吳福輝，《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 李嶸明，《浮世代代傳 海派文人說略》，北京：華文出版社，1997。
- 胡山源，《文壇管窺——和我有過來往的文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教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
- 張慶熊，《基督教神學範疇——歷史的和文化比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許正林，《中國現代文學與基督教》，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3。
- 陳青生，《年輪四十年代後半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楊劍龍，《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 夢之儀，《紙上光陰——民國文人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
- 蔡毅、尹相如，《幻想的太陽——民族宗教與文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

（二）期刊論文

- 王羽，〈三位「小姐作家」〉，《新文學史料》2007年第1期（2007.1），頁61-73。
- 朱文潔，〈東吳系女作家書影〉，《蘇州雜誌》2012年第5期（2012.5），頁19-24。
- 吳玉杰，〈中國現當代女作家的宗教情緒對女性文學的影響〉，《遼寧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1995.出版月份），頁29-32。
- 周作人，〈聖書與中國文學〉，《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1），頁1-7。
- 季紅真，〈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宗教意識〉，《文學評論》1996年第5期（1996.9），頁44-55。

許正林，〈中國現代文學與基督教文化〉，《文學評論》1999年第2期（1999.3），頁119-130。

陳獨秀，〈基督教與中國人〉，《新青年》第7卷第3號（1920.2），頁15-22。

陶嵐影，〈閑話小姐作家〉，《春秋》第1卷第8期（1944.3），頁99-102。

趙靜，〈宗教修辭研究的路徑與方法〉，《宗教學研究》2011年第3期（2011.3），頁184-188。

（三）報紙

素心，〈萬象四位女作家〉，《海報》第三版（1942.6.22）。

三、文藝創作

（一）專書

于青、曉藍、一心編，《蘇青文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上、下冊。

艾青，《艾青全集》，石家庄：花山文藝出版社，1994，卷一。

金宏達、于青編，《張愛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卷一至卷四。

施濟美，《鳳儀園》，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

茅盾，《茅盾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卷八。

湯雪華，《朦朧》，上海：日新出版社，1947。

湯雪華等，《小姐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程育真，《天籟》，上海：日新出版社，1947。

鄭家璦，《號角聲裏》，上海：大明書局，1949。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卷二，頁174-176。

譚正璧編，《當代女作家小說選》，上海：太平書局，1944。

蘇青，《魚水歡》，上海：四海出版社，1949。

(二) 報紙期刊

冰心，〈客西馬尼花園〉、〈骷髏地〉，《生命》第1卷（1921.5），頁9-10。

邢禾麗，〈空課〉，《萬象》第1卷第11期（1942.9），頁138-141。

汪麗玲，〈婚事〉（1-4，連載），《大眾》1944年4月號，頁96-100；5月號（1944.5），頁87-90；6月號（1944.6），頁88-93；7月號（1944.7），頁97-102。

徐志摩，〈卡爾佛里〉，《晨報副刊》（1924.11.17），頁4。

湯雪華，〈在醫院中〉，《樂觀》第12期（1942.4），頁22-34。

——，〈死灰〉（上、下，連載），《紫羅蘭》創刊號（1943.4），頁94-103；第2期（1943.5），頁92-100。

——，〈亞當的子孫〉（1-6，連載），《紫羅蘭》第13期（1944.5），頁155-167；第14期（1944.6），頁157-168；第15期（1944.8），頁110-119；第16期（1944.9），頁107-119；第17期（1944.11），頁111-120；第18期（1945.3），頁108-120。

——，〈神秘的髮網〉，《大眾》1945年3、4月號合冊（1945.4），頁65-70。

——，〈禍〉，《光化》第1卷第2期（1944.12），頁57-62。

程育真，〈聖母曲〉，《小說月報》第2卷第5號（1942.2），頁104-108。

——，〈星星之火〉，《萬象》第1年第11期（1942.5），頁109-116。

——，〈夜禱〉，《小說月報》第3卷第3期（1942.12），頁111-116。

——，〈聖歌〉，《小說月報》第3卷第6期（1943.3），頁82-88。

——，〈遺憾〉，《紫羅蘭》第2期（1943.5），頁81-88。

——，〈贖罪記〉，《小說月報》第32期（1943.5），頁78-83。

——，〈笑〉，《紫羅蘭》第7期（1943.10），頁62-67。

——，〈同情〉，《大眾》1944年1月號，頁81-84。

——，〈生的禮贊〉，《大眾》1944年5月號，頁73-76。

程育真，〈雲天的變幻〉，《樂觀》創刊號（1947.4），頁16-24。

———，〈玫瑰念珠〉，《生活》第3期（1947.9），頁14-20。

楊依芙，〈聖保羅教堂的晨鐘〉，《萬象》第2年第1期（1942.7），頁63-72。

———，〈燈塔〉，《萬象》第2年第8期（1943.2），頁38-49。

潘柳黛，〈黑瞳〉，《雜誌》第11卷第1期（1943.4），頁130-134。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Qingsheng. *Nian lun: Si shi nian dai hou ban qi de Shanghai wen xue* (Shanghai Literatures of Late 1940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Gunn, Edward M.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Huang, Nicole. *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5.
- Robinson, Lewis Stewart. *Request Double-edged sword: Christianity &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 Hong Kong: Tao Fong Shan Ecumenical Centre, 1986.
- Ma, Jia. *Wandering under the cross: Christian culture and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Shanghai: Xue lin Press, 1995.
- Wang, Benzhaoh. *20 shi ji Zhongguo wen xue yu ji du jiao wen hua*.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ristian Cul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0.
- Xu, Zhengl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Christianity*.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2003.
- Yang, Jianlong. *Kuang ye de hu sheng: Zhongguo xian dai zuo jia yu Jidu jiao wen hua* (Voice in the wilderness: Modern Chinese writer and Christian 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 Yu, Yuen Ye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Private space: Novel of Female Writers in Shanghai (1942-1949)", *Gender and Borders*. Singapore: CCLC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006. pp131-149.
- Zhang, Qingxiong. *Jidu jiao shen xue fan chou: li shi de he wen hua bi jiao de kao cha*. (Christian theology domain--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Sacredness in the Besieged City: Christian Culture in Female Writers' Writing

Yu Yuen Yee, Frankie*

Abstract

When Shanghai fell to the Japanese, the mainstream writers left Shanghai, leaving a vacuum in literature of Shanghai. A group of non-mainstream female writers, such as Chang Ai-ling, Su Qing, Shi Jimei, and Cheng Yu-zhen,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publish their works in magazines in Shanghai and they became very well-received at that tim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female writers' writing on daily lives is not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avoiding political censorship. In their fictions, it seems there were neither battles nor bloodshed. However, the shadows of war and occupation could everywhere be found. In their works, Christian elements and materials have become a tool to create the atmosphere and image of an ideal world in order to resist the pain, suffering and desires in materialistic world. In this way, Christian writing is another type of narration of wa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Christian elements and analyses the religious feeling in their fictions.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it also examines the writers' responses to disorder and unrest. It explores the thinking of the female writers during the Occupation Period and analyses how they overcome hardships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explores their ways to search for Utopia in this world.

Keywords: Christian culture, female fiction, literature of the Occupation Period, literature of Shanghai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